

大都市城郊文化设施社会空间分异^{*}

——以广州番禺区为例

◎ 秦瑞英

内容提要 随着我国实现小康社会、建设和谐社区的不断深入,公平公正理念日益成为城市社区研究和实践的核心问题。在问卷调查基础上,以广州市番禺区为例,运用人文生态学分析方法探析了城市社区文化设施的空间配置问题,结果表明,大都市近郊地区公共文化设施的物质空间供给与中心城区有一定差距,存在空间分布差异性,不同社会经济属性居民所构成的不同类型城市社区,其公共文化设施的配套差异明显,文化设施的社会空间分异显著。

关键词 文化设施 结构 社会空间 分异

(中图分类号)C916.2;TU9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4)03-0118-05

一、引言

近20年来,经济全球化下的“时空压缩”促成了全球生产活动的分散化重组,西方国家普遍出现产业转型和升级,使得不断增加的社会空间极化成为西方城市社会空间发展的主要趋向。全球化带来的产业转型升级引起了从业人员职业结构的变化,造成新的社会极化,构成所谓“沙漏型”的社会结构,^①社会结构的重组则进一步引起居住空间、消费空间、就业空间等产生明显的空间差异,从而带来城市物理空间更趋“破碎化”,引发各种社会问题与矛盾,促使城市公共资源分配的社会公平以及对应的空间公正问题成为诸多学科关注的焦点。大量研究表明城市社区资源的社会空间配置与城市社区居民生活空间质量的提高密切相关,文化娱乐场所是城市社区居民日常生活活动的主要空间场所,文化娱乐服务设施是影响居民健康生活的物资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构成城市居民健康和健全生活空间的

六大社区资源之一。^②不同社会阶层居住区的社区资源在数量分布、质量水平及构成上存在显著差异。表现为公共服务设施供给的机会结构水平和社区资源可接近性水平不同,决定着社区生活空间质量的本质差异,^③城市社区生活空间质量的高低可以用社区资源的可获性进行评价。社区资源的可获性不仅可以进行客观调查、测量与空间量化,还可以依托居民行为心理进行空间感知。^④

我国学者对城市社会空间分异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大多数学者借鉴西方传统的经典理

^{*} 本研究受广州市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世界文化名城建设与文化产业研究基地资助。

^① 李志刚、吴缚龙、卢汉龙《当代我国大都市的社会空间分异——对上海三个社区的实证研究》,《城市规划》2004年第6期。

^② 王兴中《中国城市商娱场所微区位原理》,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226页。

^③ 高军波、周春山《转型期城市社区资源配置的社会分异研究——基于广州的实证》,《现代城市研究》2011年第7期。

^④ 王兴中等《国外对空间剥夺及其城市社区资源剥夺水平研究的现状与趋势》,《人文地理》2008年第6期。



论和方法来解释具体城市或社区的社会空间分异,以实证研究总结出北京、广州、西安等大城市社会空间分异模式,分析城市社会空间分异的形成及运行机制。^①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我国实现小康社会的不断深入,公平公正理念逐渐引入国内理论研究,日益成为城市社区研究和实践的核心问题,越来越多的学科和学者开始关注社会公共资源分配的公平公正以及城市居民生活空间质量问题。^②对于作为社区资源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的文化设施,国内学者将其建设看作是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重要方面,关注文化设施的物质空间均衡配置问题。^③较多研究侧重于对地域性或具体类型文化设施的空间布局特征及原因探讨,并提出规划建议。^④总体来说,国内对文化设施的研究还主要偏重于对设施在物质空间上的均衡布局,对文化设施使用者的社会属性关注较少,即对不同社会经济属性的居民对不同类型、质量、功能的设施的需求研究较为缺乏。

本文在分析广州番禺区文化设施物质空间供给结构基础上,结合问卷调查分析,探讨城市社区文化设施配置的社会空间差异和类型划分,从人本主义出发,提出调整和优化城市郊区文化设施社会空间配置的政策建议和具体措施,不仅有助于认识国内转型期城郊地区城市社会空间的碎化特征以及文化设施的社会空间不均衡性,丰富我国大都市城市生活空间结构研究的理论框架,而且有助于进一步发挥文化在城市发展中的社会融合作用,促进社会公共文化资源的空间公正,维护社会公平,对于建设和谐社区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二、研究区域及方法

本研究选取的案例地广州市番禺区是广州市城市空间“南拓”发展的重点区域,是广州旧城居住功能疏解的主要地区,是广州城市居住郊区化的显著表征。作为城市发展的新城区,番禺区与广州中心城区相比,在公共服务设施,尤其在文化设施配置方面存在较大差距,社会空间分异的特征明显,具有典型代表意义。

研究区域包括2012年调整后的番禺区10个街

道、6个镇共16个镇街。主要选取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文化站(文化中心)、文化室、文化广场等公共文化设施为研究对象,通过分析不同阶层社会群体居住区公共文化设施配置的社会差异探讨城郊城市社区文化设施配置的社会分异特征。基于实地考察及统计年鉴,首先分析了文化设施供给的空间特征,然后结合2012年番禺区文化设施问卷调查,用番禺区16个镇街空间单元的七种文化设施数量规模、人均规模等变量与24种人口社会经济变量构成基本数据矩阵,采用主成分方法及系统聚类法对各空间单元进行聚类,并结合实地考察对聚类结果进行分析,得到番禺区文化设施社会空间分异的基本特征。

三、番禺区文化设施空间供给结构特征

1. 高等级文化设施分布高度集中

番禺区镇街级及以上文化设施共42处,其中位于中心城区的市桥街就有11处,占全区高等级文化设施总量的28.6%,且区级图书馆、文化馆和文化中心都集中在市桥街,镇街级文化设施数量也是全区最多,成为全区文化设施空间分布的核心区。沙头街和桥南镇则以占全区11.9%和9.5%的规模处于核心区的外围,成为第二圈层,其余街镇构成第三圈层,从而形成番禺区核心—边缘式文化设施供给空间格局。

2. 社区级文化设施规模的空间差异显著

从社区级文化设施空间供给密度上看,各街镇

① 许学强、胡华颖、叶嘉安《广州市社会空间结构的因子生态分析》,《地理学报》1989年第4期;顾朝林、C·克斯特洛德:《北京社会极化与空间分异研究》,《地理学报》1997年第5期;王兴中《中国城市社会空间结构研究》,科学出版社2000年。

② 王兴中等《国外对空间剥夺及其城市社区资源剥夺水平研究的现状与趋势》,《人文地理》2008年第6期;邓万春《时间、空间与社会理论重构的谱系》,《人文杂志》2013年第7期。

③ 谭平《文化设施配置优化问题研究》,《科学学研究》2010年第2期;杨泽霖《浙江省公共服务设施空间配置与优化策略研究》,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

④ 张景秋《北京市文化设施空间分布与文化功能研究》,《北京社会科学》2004年第2期;魏宗财等《深圳市文化设施时空分布格局研究》,《城市发展研究》2007年第2期;丁绍璐、张景秋《北京城区文化设施利用的空间分异研究——以博物馆、体育馆、展览馆为例》,《北京社会科学》2010年第3期。



空间差异显著。东环街、市桥街、大石街作为番禺中心区,大型楼盘的主要集聚区,公共服务配套相对完善,文化设施类型比较齐全,数量规模较大,文化设施布局密度都在2处/KM²以上,新造镇、南村镇、洛浦街、钟村街都在1处/KM²以上,而其余街镇受到地域面积、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影响,设施空间密度在每平方公里1处以下,与中心区差距较大,小谷围街文化设施密度仅为0.19处/KM²,仅是密度最大的东环街的8.7%。

3. 设施人均规模差异较大

人均文化设施建设规模能够体现街(镇)之间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差异。基于各镇街文化站、文化广场、文化室等文化设施的人均建筑面积规模差别,番禺区16个街(镇)可划分为文化服务优势区、文化服务一般区、文化服务弱势区3类。将人均文化设施建筑规模为全区平均规模水平2倍以上的街镇划为优势区,主要有钟村街、石碁镇、南村镇和石楼镇,将人均规模低于全区1/2平均水平的街镇划为弱势区,主要有小谷围街、大龙街、化龙镇和市桥街,其余街镇为一般文化服务区。作为中心区的市桥街尽管是高等级文化设施的集中地,但在设施人均规模上反成为弱势区,主要缘于它是全区人口密度最大的街镇,地域狭小,很多社区没有独立文化室,建筑面积不达标。处于优势区的街镇不仅人口密度较小,且街镇资金投入较大,尤其是社区级文化设施建设规模较大。可见,中心区文化设施的优势在逐渐削弱,而边缘区域的配置优势程度在不断提升。

四、番禺区文化设施社会空间分异

1. 番禺区文化设施空间分布的主因子分析

(1) 主因子提取

首先,以7种文化设施变量和24个人口社会经济变量组成的原始数据矩阵,建立原始数据库,然后应用SPSS软件进行标准化处理,并采用方差最大化正交旋转进行主成分分析,提取出6个主因子,其中前6个主因子的累积方差贡献率达到79.621%(参见表1)。说明这6个因子能够反映33个指标的大部分信息,同时得出各因子的载荷矩阵。

表1 主因子分析的特征值及方差贡献

主因子 序号	特征值	解释方差 百分比%	解释方差累积 百分比%
1	6.851	23.623	23.623
2	4.602	15.870	39.493
3	4.021	13.866	53.360
4	3.247	11.195	64.555
5	2.415	8.326	72.881
6	1.954	6.739	79.621

(2) 主因子的确定及空间分布特征

根据载荷矩阵,第一主因子中,文化馆数量、图书馆数量、镇街级文化广场数量、户籍人口、图书馆藏书量等有较大载重,且呈正相关关系,说明该因子主要为拥有文化馆、图书馆、镇街级文化广场数量较多的户籍人口,因此,将其概括为高水平文化设施。该因子得分较高的区域主要集中在中心城区;第二主因子中,干部科教文体卫或新闻工作者、文化程度小学及以下、农村人口占比、非农业人口占比等指标有较大载重,且与非农业人口占比、职业干部科教文体卫或新闻工作者呈正相关,与文化程度小学及以下、农村人口占比呈负相关,说明该因子主要为非农业人口比重较大的干部、科教文体卫或新闻工作者,将其概括为干部、科教文体卫或新闻工作者,因子得分最高的区域集中在中心城区及外围地区;第三主因子中,年龄36~54岁、初中文化程度、高中文化程度、工人商业餐饮业或其他服务业人员等指标占较大载重,且呈正相关,将其概括为中等文化素质的蓝领。主要集中在大学城周边及东部乡镇地区;第四主因子与家庭收入10000~20000元、20000~30000元呈显著正相关,将其命名为高经济地位。主要集中在临近佛山市的西部和毗邻广州都会区的北部地区;第五主因子与文化室规模、村级文化广场人均规模、街镇级文化广场人均规模、文化室数量等指标呈明显正相关,将其称为基层文化设施。集中分布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镇和街道;第六主因子与研究生以上文化程度、企业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等显著正相关,称为高社会地位。集中在毗邻广州南部的商品房开发集聚区。

2. 公共文化设施社会空间分异特征

根据因子载荷矩阵,计算出6个主因子在16个



街(镇)空间单元上的得分,建立基本数据矩阵,然后进行系统聚类分析,可将番禺区文化设施的社会空间划分为五类:高文化设施水平的高社会地位人口聚居区、文化设施配备条件好的蓝领聚居区、文化设施较好的农村人口聚居区、文化设施条件一般的人口混合区和文化设施较差的白领聚居区。

(1) 高文化设施水平的高社会地位人口集聚区

该类型区域主要是市桥街1个空间单元,是番禺区的中心地带,区政府所在地。该区域绝大部分人口属于非农业户籍人口,文化程度在大专以上人口所占比例较大,尤其是研究生以上学历人口比例大,职业结构上主要以政府机关、事业单位人员和企业管理人员为主,居民的收入水平和社会地位都较高。作为番禺区的行政中心,该区域集中了全区大部分的高等级文化设施,镇街级及以上文化设施就有11处,占全区的28.6%,拥有区级图书馆、文化馆和省特级文化中心,以及6处镇街级文化广场。但由于地处中心城区的核心区,人口密度全区最大,达到12811人/平方千米,且商贸业发达,用地紧张,导致很多社区没有独立的文化室,建筑面积没有达到广州市相关规定的200平方米的用房面积标准,因而在文化设施的人均规模上却处于全区劣势地位。

(2) 文化设施配备条件好的蓝领聚居区

主要分布在番禺区的中北部和东南部,包括南村镇、钟村街、石楼镇和石碁镇。该区域户籍人口占到一半以上;人口的文化结构以高中、初中文化程度为主,职业构成上工人、商业、餐饮业或其他服务业人员占较大比重。四个空间单元中唯一的街道钟村街也是2010年才由镇转制而来,镇域经济发达,区域人均GDP是全区人均值的3倍多,财力雄厚,对文化设施的资金投入力度较大,文化站、镇街级文化广场、村级文化广场、文化室等社区级文化设施不仅数量多,人均建筑面积拥有量也居五类区域之首,是社区级文化设施配置条件最好的区域。

(3) 文化设施较好的农村人口聚居区

主要分布在西部和东北部,包括石壁街和新造镇,农村人口占到近90%,是农村人口占比最大的地区,以户籍人口为主。初中及小学以下人口所占比例最大,达一半以上;职业构成上以商贸、餐饮服

务业以及个体户、自由职业者居多。文化站、镇街级文化广场人均建筑面积仅低于蓝领集居区,村级文化广场、文化室的人均拥有面积也处第三位。一方面石壁街集聚了祈福新村、南国奥园、碧桂园、锦绣香江和雅居乐等著名的大型楼盘,公共设施配套较好,另一方面,这两个街镇目前都以农村为主,土地资源丰富,村级文化设施建设用地比较宽裕,且建筑面积大,文化设施的人均拥有面积较大。

(4) 文化设施条件一般的人口混合区

主要分布在番禺区的西南和北部地区,包括桥南街、沙头街、沙湾街和小谷围街。以非农业人口为主,户籍人口比重略高于非户籍人口;人口文化程度大多在大专以下。职业构成多样,既有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也有工业、商贸服务业从业人员;既有企业管理人员、公司职员,也有个体商户、私营业主,人口混合特征明显。该区域公共文化设施条件一般,文化馆人均建筑面积、图书馆千人藏书量等均居五类区域的中游,镇街级文化广场人均拥有面积则居第二位,社区文化广场、文化室的人均占有面积则处于下游水平。主要由于各个空间单元差异较大,桥南街是番禺区目前主要的高尚住宅区之一,文化设施条件较好;小谷围街是广州大学城的所在地,公共配套先天不足,又是该区域经济条件最差的地区,受财力所限,属于街道管理建设的文化公共设施供给较差,尤其是文化室建筑面积不达标;而桥南街和沙头街作为原市桥街分设出来的地区,属于老城区,文化设施陈旧,人均拥有面积较小。

(5) 文化设施较差的白领聚居区

主要分布在番禺区的中心城区、东北部和西北部,包括东环街、大龙街、大石街、洛浦街和化龙镇。该区域非户籍人口占到一半以上,非农业人口占到2/3。文化教育程度为高中和大专以上人口居多,专业技术人员、公司职员的比例较高,东环街作为老中心城区,商贸服务业人口比例也较高。大部分人口家庭收入在5000~10000元/月,为一般白领阶层的集聚区。虽然在公共文化设施的数量上处于五类社会区域的中游,但在人均规模上,除了图书馆的千人藏书量居于第二位之外,其他文化设施的人均拥有量都排在五类区域的下游,尤其是文化中心和镇街



级文化广场的人均规模都仅略高于市桥街。这一方面归咎于地处中心旧城区,人口密集,商贸业发达,地价及租金较高,基层公共文化设施难以达标;另一方面由于大石街、洛浦街区位上临近广州中心城区,是市域人口向南疏散的最早和较集中地区,房地产开发较早,公共文化设施的配置相对滞后。

五、结论与建议

随着西方发达国家进入后工业化阶段,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人本主义思潮的兴起,学者们对城市公共资源分配的社会公平以及对应的空间公正问题愈发关注。作为社区资源重要组成部分的文化设施是人类进行大型文化活动的空间载体,是居民日常休闲娱乐的重要场所,文化设施的供给及空间分布越来越影响到城市居民生活质量的提高和社会公平,^①成为城市社会地理学研究的前沿性课题。本文在分析城市社区文化设施的物质空间特征基础上,采用因子分析和聚类分析法,将快速城市化的广州城郊——番禺区的城市社区文化设施社会空间划分为五种类型区域,即高文化设施水平的高社会地位人口聚居区、文化设施配备条件好的蓝领聚居区、文化设施较好的农村人口聚居区、文化设施条件一般的人口混合区和文化设施较差的白领聚居区,研究表明,城郊地区城市社区文化设施不仅存在物质空间的分布差异,不同社会经济属性的社区居民所构成的社会空间上的文化设施配置也存在差异,并且文化设施的物质空间与社会空间之间的耦合地域差异明显,呈现不协调状态。文章从人本主义理念出发,探讨城市社区文化设施的社会空间分异特征,不仅丰富了我国城市社会地理学理论研究,也为城市管理者在公共文化设施供给决策方面提供借鉴,对于和谐社会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随着我国大都市城市空间的不断扩张,郊区化的不断加剧,城郊地区的文化设施不仅在供给空间上存在较大差异,社会空间分异特征也将愈加显著。为此,首先应针对快速城市化带来的广州城郊区文化设施物理空间与社会空间之间的不匹配,加强对大都市郊区化的政策引导和规划调控。一方面要通过政策引导和产业布局优化将近郊地区中心城区人

口向周边区域疏散,降低人口密度,增加人口稠密地区的公共文化设施资金投入。另一方面,政府可通过土地控制和免税政策等进行引导,倡导混合居住模式,即将不同收入和阶层的居民在邻里层面结合起来,形成相互补益的社区,降低社会空间分异所带来的阶层隔离程度,以利于和谐社区的建设;其次,健全城市文化设施服务的空间体系。在现有空间供给格局的基础上,健全由中心城区、中心镇(小城镇)、社区中心组成的城市文化设施服务空间体系,即在不同层级的区域中心配备相应规模和质量的文化设施,尤其要加强社区级文化设施的建设,从而构建完善的城市文化设施服务空间体系;^②第三,要通过科学合理的城市规划和社区规划提高社区文化设施资源的空间可接近性和居民的机会可获性。规划师们应充分考虑到城市各类社区的社会差异性,关注不同群体的文化消费需求,尤其是外来人群、低收入群体、老年群体及女性群体的文化服务需求差异,实行差别化文化设施供给和建设,通过满足不同层次、不同群体的文化消费需求,实现社区整合和融合,提高居民的生活空间质量;^③最后,要看到我国城市中产阶层化趋势不断加深,中产阶级正不断发育壮大,其追求文化消费的个性化,彰显社会地位和文化品位的文化需求,促进了城市商业性文化娱乐场所的发展,要重视对商业性文化娱乐场所的社会空间或社区空间结构的研究,将有助于满足中产阶层多元化文化消费的需求,促进城市文化娱乐产业的发展,增强城市创新能力。

作者单位:广州市社会科学院

责任编辑:秦开凤

^{①②} 高军波、周春山、王义民《转型时期广州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分析》,《地理研究》2011年第3期。

^③ 楚静、王兴中、李开宇《大都市郊区化下的社会空间分异、社区碎化与治理》,《城市发展研究》2011年第3期。

